

路漫漫

第二部《泪》

(下)

白社诚著

天马出版社

这本回忆录，…是不正常的时代的一面镜子。总结一下，不失为人民的精神财富。…他上书言事挨整，历史却证明正确的是白祖诚，而整他是错误的，他所坚持的道理和努力是对的。

--任继愈

他偏于执著、…然而也有个好处，就是记述了真实的史实和个人心路和历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他的回忆录里，我们会得到许多启发。他有不少经验值得写下来，…。

--王蒙

他不仅回忆事，还回忆思想，而且夹叙夹议，更有深度，…有启发。…真实的多，可靠的多，可信的多。他注意当时大背景的研究，使回忆有“根”。

--王汎

路漫漫兮，无远弗届！艰难跋涉，矢志进取。…“火”的考验、“泪”的洗礼，…无限的沉思。痛定思痛，忧深思远。他的思想飞跃，他的意识升华。凤凰涅槃，浴火新生，凤凰翱翔！

--卞奎星

他从新精神抖擞，风发意气，尽力追回丧失的时光。…帮助人们牢记过去历史教训。

--齐怀远

细腻的笔法，详实的记载，将我们引进五十年前的世态人心，…作者将个人的坎坷曲折经历与历史背景和重大事件结合得紧密。…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探索，…是有启发有价值的。

--吴思

青年时代…，追求真理，探索光明，…耄耋之年乐观豁达的心态，执著探索的精神！

--吴泽民

一部浓缩的…世纪政治风云录。…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既有较详细客观的对事件的叙述，又有…具体经历；既有…强烈感受与思想斗争，又有…冷静的思考。

--张泽石

坎坷经历，曲折道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反思与探索。…得到启迪

--陈建勋

千万追求光明的人，祖诚就是一个典型。他写出真实历史。…普罗米修斯也出了深渊！

--钟鸿

可贵的是，受此人生挫折，他并未消极、…而是认真思考，上下求索。…终于献出这部用心血写就的人生自白。会给后人带来无论对社会、对个人，以重要的启迪。

--唐绍明

一位“两头真”的人。从年轻时代追求真理，到老来更加探究真理、热爱真理，并且有了重大的成果，那正是摊开在我们面前的沉甸甸、赤裸裸、发着热、发着光的回忆录！

--褚律元

大地回春，沉冤大白，…完成了《路漫漫》…。让后人记住那段历史的教训。…

--尉淑兰

血泪结晶。一个动荡时代的缩影。…磨难中，闯过一道道关、…炼就了一身铮铮铁骨。

--白祖芸

坚定的乐观精神。…遭受到沉重打击处于严峻逆境时，仍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秦顺新

反映了…历史真实，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有其典型代表性的实例，一颗能从中窥探这段历史真貌的坚实而蕴有光芒的砂粒。

--祖诗、丽娟

十四、少小离家大始归

一九六三年四月，弟弟的妻子董坤德来京开会，一个星期日晚到我家聊天时，说到昆明许多情况，正上小学三年级的小薇在旁听得神往。坤德就开玩笑说：“小薇，我过几天回昆明，你跟我走吧，暑假再送你回来”。孩子认了真，就磨我和妻，要求和婶婶一块去昆明玩一次。妻起初坚不同意，认为她还有半个学期课，又不放心她小，去了怎么回来等。我嘴上也先不同意，心里却觉得未尝不是好事，难得机会有婶婶带她走之便，让孩子回一趟老家，增长点见识，母亲来京时十分喜爱这个孙女，她去也可慰老母思念之心。小薇磨闹不休，好不容易哄她睡后，耐心说服了妻。第二天早上告诉了女儿，她高兴得跳起来。妻为她准备了必要的行装，我则给她写了几条回老家后在学习、生活、礼貌方面的守则，包括自学后半学期的功课，每周至少给我们写一封信汇报情况等。几天后，妻送坤德和她上了火车走了。

我在联谊汽车修理厂时，就接到母亲和弟弟来信，说他们希望我能回老家一趟，如能一家三口一块回去一趟更好，因为亲人们都很想念我，也很想见见我的妻女。特别是从小照看我的大娘，已经双目失明，十分悲苦，常说希望生前能再见我一面，要求妈妈和弟弟写信给我转达她这点最后的心愿。我已回到人民队伍，应该可以向组织上说明情况，请求给予一个月至少二十天假期探一次亲。这些信，触动了我的思亲思乡之情。本来一九五七、五八年，我与父母亲说好要争取一两年内回去一次。但风云突变，我被打入到劳动改造之境，还要努力“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自然无从考虑此事。摘了“帽子”后的一年多，由于还是刚得“解脱”，还没正式分配工作，不知落脚何处，也不敢想这事。现在到了公社，看来是比较长期的安排。我也来了好几个月，女儿又已去了昆明，我去一次可以顺便接她回来。这些理由，似乎可以试着找领导说说，看看有无可能得到允许。于是，我找贾书记谈了这个想法。他以理解的态度表示到麦收大忙过去后可以考虑。

麦收完成后，贾主动找我，叫我把手头工作安排一下，能做完的做完，一时完不成的交代一下，可以给我一个月假探亲。我高兴地谢了组织上的

关怀,按要求把工作结束或交代了,并逐项写出报告或书面材料。到七月上旬全部完成。找贾请示,商定从七月十一日起假,八月十日销假回到公社。

又是薇帮我收拾行装。一切就绪,临行前夜,我心情激动,得小诗一首:

《整装待归乡》——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于东皇城根小屋。

少小离家大始归,一十七载韶光催。高堂明镜发先白,游子灵台志不微。

北野风光多秀丽,南国花木倍芳菲。此行岂只慰乡愁,更看山河遍地辉!

这诗自然是借题于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但没他诗中“乡音不改鬓毛催”的伤老之情,而是寄寓了对北野南国神州大地处处将看到美丽光辉的想像与期望。虽然带着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却是我心情的真实表述。诗的首句把贺诗的原句改了两个字,“老大”改为“大始”,因为这年我才三十四岁;末尾“回”改为“归”,则因这里我更喜欢“归”字。

准备行装时,除了自身用品外,离家十七年了,能给老家亲人们带点什么礼物呢?左考虑右研究,根据当时经济条件和我能负的重量,决定买些北京特产小食品,如果脯、芙蓉饼等,还买了点绸料给亲人们选做衣服。最有特色的是:买了两个还较生的大西瓜,给妈妈和大娘带去。那时昆明没有西瓜,试着引种过但长不好,又小又没味。我小时她们常向我们夸赞北平的西瓜如何甜美,慨叹再吃不到了。我想给她们一点惊喜,也想给其他家人哪怕一人一小片也尝尝。那时成昆铁路没修通,火车只能到株洲换车到贵阳,然后乘汽车到云南霑益,再换火车到昆明,共要走一个星期。当然从贵阳乘汽车直接到昆明也可以,但车票比火车贵不少。我决定用省钱的办法。为了怕西瓜路上坏了,所以选买半生的。怎么带呢?用两个网兜装上西瓜,我找了一根粗竹杆,截短到一米多点作扁担,这样挑起来提着两个大包的双手还可以用肘腕兼顾控制两个瓜不晃荡。只要挑上车就好办了。就按此法,从家上公共汽车到北京站上了火车。这副挑担子带行李的模样,一路引人注目,发笑,不管它。虽然费了劲,但那时身体好,又饱经劳动锻炼,不在乎这点苦累。

火车是慢车,大小站都停,一路不断上人,车厢越来越挤,上厕所都难。株洲换车后也是这样。行李架上也挤得满满的,我的两个西瓜和一个旅行包塞座椅下,另一个包只好抱着。同车人看我的打扮模样和带的东

西,都有点奇怪,近座的询问,知道我是远别回乡探亲,表现同情,我上厕所时主动帮忙照看东西。慢慢熟了聊天无所不谈。这些旅客九流三教都有,两三天下来,使我有机会接触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了解了许多社会情况、风土人情,得到以前未有过的感性知识。虽然晚上只能坐着醒醒眯眯地睡几个小时,但有此收获,倒情绪饱满,不觉怎么困倦。

到了贵阳,找到长途汽车站,一问,去昆明的车票不便宜,而且两日内的票已卖完,要等后天。正在为难,这时有位中年人过来聊问,知道我的情况后说“你搭我的车吧,坐‘头等舱’(指司机旁的副驾驶座),今晚就走。只要你给长途车票价的一半”。我这才知他是位卡车司机,是运援越军用物资的,不到昆明,直开到霑益就往西去了。我考虑一下,除价钱便宜和时间快外,还可免去找旅馆住旅馆的麻烦,确有优越性。就同意了。他帮我拿手上的部分行李,走到不远处他的车旁,上了车,行李也都塞进驾驶室。他说等晚上晚饭后天较凉快了开车,你可以遛遛逛逛,晚七点多来这。说着把驾驶室锁上就走了。我有点不放心,又一想看这人不像骗人的,就悄悄记下他的车的牌号,真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到贵阳,看看车站一带和附近马路,都够脏乱,商店和挑担推车小贩倒是很多。在一个小摊吃了些与云南相似的小吃。买了几张报纸,回到停车处,司机还没来,就找个地方坐下看报。近晚七点半,司机来了,立即上车出发。天仍闷热,把车窗全大开,不久后就感到蚊子扑面叮人。司机说过一会儿开快了上到高山就会好些。果然如此。山路渐高渐陡,车路宽只容两车道,遇对头车时小心错开。夜色初罩,依稀可以看见下面是万丈悬崖深谷,令人心悸,性命全系于司机之手了。等到天全黑下来,只有微弱星光,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车前两道灯光直射前方。司机泰然自若,照样快速行驶。夜色中可见前后每不远距离就有一处车灯光。司机告诉我:援越运输紧张,可能有几百辆卡车都在昼夜赶运。司机们都是好手,走惯了,也不觉得怎么。当然,也偶有极个别因不小心或路临时坍滑等原因出事的,那就车毁人亡粉身碎骨了。那是命,赶上了就赶上了。人生就是这样,你再小心,也有意外的时候,只要正常情况下能自己掌握好避免灾祸就是了。这话很有哲理啊!

由于是盛夏,我带的衣物很少。只一个中等大小的旅行包。司机问我带件长袖衣服没有?我说包里有件褂子,他说那就好,路上虽是高山,但蚊子多,叮人也厉害哩。是老乡,增加了亲切感,一路聊天,谈些家乡事,倒不寂寞。他好像是蒙自或楚雄人,姓名记不起了。他告诉我,越南先是和法国人打、和南越打,美国帮南越,现在又准备还要和美国人打,看样子是要

打。他们国家小，经济落后，一多半军火还有许多食品、日用品都是靠我们支援的。上千辆大卡车昼夜不停地运，老百姓看着说“这要多少东西多少钱呀！”他说“当然反美帝国主义我拥护，可我们国家也不富裕啊！”又说“反正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哩！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开车干活，挣钱养家”。他告诉我：干这任务很辛苦，而且有风险。这深山老岭弯多坡陡，路又窄，刚够对头车错开。再好的司机也不敢保证就不出事。翻大山沟里连屍骨都找不见的事也一再发生过。可为了多挣点钱就干吧。原来开这车挣的钱比正常的省内和省际间长途货运挣的钱要差不多上一倍哩！听他说，我对长途货运司机的工作、生活了解了不少，好像也有了点感性体验。

车不断发出忽似轰鸣忽似喘气的哼叫声，在群山中蜿蜒起伏，我俩聊聊天歇歇，不觉已走了约五个小时，天早已全黑，在崇山峻岭中一闪一亮的车灯像不见头尾的长蛇，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色，深感有一种美。

正赏看遐思中，司机叫了一声“到歇脚地方了，休息！”我这才看清是到了一处较宽阔像个场子的地方，那边有几间土房，门边木杆上吊着盏灯，窗子也透出光亮。停着三、四辆卡车。司机说，前面还有处较大的地方，有小旅店、饭铺，可还要走一、两个小时。他说“现在夜里十二点了，我睡了。这户人家可以住人，我也熟，常在这睡。现在看来已有几个人住下，我去没问题，你家（‘你家’是云南话对说话对方的尊称，家在此读‘皆’——JIE 音，意思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您’）。此前司机一直就称我‘你’，不知为何从这时起换了‘你家’）去恐怕挤不下了。可以在这车楼子里睡一觉，一个人安静，也省钱。你家看行不行？要不行，就往前走，住小店去”。我说“行，我就在车上睡”。他说那好，就走进那边房子去了。我在车里躺下试试，用书包做枕头，上半身没问题，就是腿伸不直，只能仰卧把膝部拱起脚蹬在司机那边车门上，或是侧卧把腿横着蜷起。就这样吧！天热，只在胸部盖件外衣就行。躺了会儿，觉得空气闷，就坐起摇下车窗玻璃。这可惹了麻烦，不一会儿就飞进成群的蚊子向脸上胳膊上扑来，轰、打都无济于事，不一会儿已叮得我痒痛难忍。最后我想了个办法，找些枯枝干草，点然后（那时我抽烟，随身有火柴）再弄灭，用烟来回熏赶。这法子果然奏效，蚊子基本上被赶出去了。我赶快关严玻璃窗。然后再扑打消灭了剩余的少数蚊子。倒是清静安宁了，但又来个新问题：楼子内烟气眯眼刺鼻，只能忍着点等它慢慢从缝隙中散退，折腾了约一个小时，烟渐消散了，时间已是凌晨，闷热稍退，我也乏睏了，躺下睡着了。

第二天刚天亮约六点钟，司机精神饱满地回来了，还给我带来两个热

乎乎的洋芋粑粑，就是用土豆泥加点作料捏成的烤熟的饼子。我谢谢他，喝点带着的军用铝制水壶的水就着吃了，也精神抖擞起来。在那样狭小只能蜷卧又闷热不透风有烟味的车楼子里，我居然能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酣，增加了一种与在一担石沟冬天在荒野帐篷中睡觉可以媲美的体验！人就是一种这样奇怪的动物，在舒服的环境里舒服惯了，很舒服的条件还觉得这不好那不好；遇到或被逼处恶劣环境，什么条件都没了，也什么都能适应了。当然，这种内心的感受，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是真的自觉适应高兴舒心，有的人是适应后而故作不在乎之态，有的人则是勉强适应内心委屈抱怨，这种差别全在于个人主观的思想、意志和心态。只有明达开朗坚强乐观的人，才能在逆境中保持积极泰然的态度，把克服战胜肉体上、生活上困难与折磨的体验，积累转化成自己精神上的资源，从中感受到喜悦与舒畅！我前面说的车上蜷卧睡觉，不过是件极平凡的小事。但引发的这番议论，却是我多年逆境中战胜巨大艰险困难的一点心得和记实。在此借此小事一说而已。

天气清新明亮，车跑得也快，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深谷激流间盘旋上下，风光实在壮丽，也有惊心动魄之感。但前后看看，各相距几十米到百余米的车辆都是大体相同的速度平稳地行驶。我不禁对司机赞叹道“你们在这样路上开车，够辛苦也真够不简单！”他笑着回答“哎呀，你家这么说。其实惯了，对我们云南司机来说，平常得很嘛！”（他只说云南，不提贵州，大概因为他是云南人。不过我的观察，好像也是云南特别是迤西的横断山脉地带路更险峻）。他数着我们已经走过的和前方将到的弯道地段说：“二十四道湾，四十八道湾，…弯弯多了，滇缅路上还有什么七十二道湾，八十几道湾…。反正山上修路就是绕着转。路又窄，要往宽修成本就更高了，修不起，够两个车并着略宽点就行了。外地司机乍来一看都心颤。所以有人说‘在云南开惯车的司机到别处哪也不怕了’。这里开车是要点技术和经验。反正胆大心细就是了。惯了就不怕了。不过，说是这么说，再小心再有经验的老师傅，也不敢保就不出意外。就是你开得没问题，还有路况意外哩。滑坡、塌方、泥石流叫你赶上了也没法。那就只好认命吧！”

弯有大小缓急之别，遇到急窄之弯，这位经验丰富路况甚熟的司机也特别聚精会神，两手不断快速地转动方向盘，脚下刹车与离合器也时松时紧，我随之提心吊胆。到了路况较平顺的路段，则畅观崇山大谷青山碧野的景色。从贵阳到沾益的公路里程大约五百多公里，走了整两天。上车后第一天傍晚到午夜走五个小时，第二天一大早到晚，除中午吃饭和司机几

次短暂停车稍事休息外，走了十五、六个小时。晚上八、九点钟终于到了沾益。我印象小城内依然很热闹。我给司机付了钱，第二天他要继续向西再向南行去越南，还要两三天时间。我们互祝平安告别。沾益是滇北重镇，特别在云南对外交通上是重要枢纽。我是第一次到此，把行李暂时寄存，到主要街道遛游一番。我在小摊上买了碗“汆肉米线”和玉米粑粑当晚饭吃了，这是离乡多年后第一次重新吃到云南特有的小吃。

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进，四人一间房。倒头再睡了个好觉。次日早上到不远的沾益火车站买了票，好像是近午时间开车。挑上行李上车，向昆明进发。在车上发现带的两个西瓜中，一个已发软，怕是坏了，舍不得扔，还是带着吧。进入云南后，特有的红土高原景色出现了，竹林也出现了，林木自然众多，红土绿林、蓝天白云，构成美丽的乡色，引发我少年的许多回忆。几个小时后，我就要见到久别的亲人了。

下午，我到达昆明火车南站。仍然肩挑手提地挤上公共汽车、换车，到华山西路下车，终于走到了阔别的登华街二十四号家门。行程正好整整一个星期。

一进门人们发现我，一片“祖诚回来了”的喊声响遍前后院。大姐引领我径直先到后楼堂屋，放下行李。母亲来了双手扶着我脸看，掉下泪来，大姑也由人搀扶颤巍巍地下楼来了，伸手来摸我…在众多问长问短和倒茶水和端洗脸水的嘈杂声中，我坐定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大声说：“妈妈、大娘，我给你们带北京的西瓜来了，就是一个恐怕坏了，快拿刀来切开看看”。果然，那个发软的西瓜切开已有臭味，只好扔了。另一个还好，而且熟透了，很甜。我亲自切下四块，请妈妈、大娘各吃两块，其它由大姐切分给各人，给还上班未回的诗弟夫妇留下两块。女儿小薇从见我时跑来抱着我问好后，一直懂事地坐一旁听大人说话。分瓜给她时说“我在北京随时能吃到西瓜，别给我了，给奶奶、大娘和别人吃吧”，母亲心疼地把她搂到怀里，非把自己手中的瓜给她吃。

吃完瓜，围坐一堂叙别。都叫我先说，我大致叙说了十七年来的简况，大家又问这问那。我叙说中，总的掌握一个基调，就是多说好的快乐的光明的事，不说少说不好的悲苦的难过的事，免陷“黑暗风”之窠。其实我也不是刻意如此，这确也是我真实的心态。我是个积极乐观的人，何况我以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是柳暗花明了！亲人们好像也是如此。不过她们是有许多话先不说，我刚到，要多说宽慰的欢喜的话，让我放心。

谈聚暂告段落。小薇过来倚我怀里，轻声说“爸，你想不想去翠湖看

看，我想和你一块在翠湖照张相寄给妈妈和姥姥看看。我早就想着这件事了”。我看着女儿期盼的小脸，非常理解她的小心灵。她要穿上奶奶给做的花衣裳在翠湖的美景前照张相寄给深爱她的姥姥和妈妈！多纯美的童心啊！这个想法也合我的心意，我也急于重睹儿时几乎每天经过和游玩的翠

湖，也愿寄去张和孩子一块的相片让北京的妻和亲人们高兴放心。我带着她和诗弟的女儿小波去了，在湖边坐了一会儿，留连一番。

诗弟和弟妹坤德回来了。他们住堂屋左边的屋子，晚上和我畅谈。我们第一次彼此互叙了被打“右派”的经过，也概述了后来多年的情况。我那时还没有充分觉悟到我“自投罗网”之举给全家人造成的伤害和悲剧，甚至还把此举视为自己对党“忠诚”的正确行动。诗弟只静听，未作任何表态，只说“一切都过去了，你先好好休息几天，然后我们陪你去上上爸爸的坟，看看滇池、西山…再详细聊聊”。

大姑从见面(实际她已失明，见不了面，只是到家时听我喊她和伸手来摸到我)起，一直希望和我单独谈谈。她说“祖诚，十多年了，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说，恐怕我只有这次机会了，再不会有！”说得我难过。一天晚上，我到她在父亲去世后一直住的楼上左边屋子，就是我离昆前住的那间，听她说了一晚上。说的内容是：(一)家史。她说“你小时没和你详说过我们白家的历史，你爸爸早早过世了，现在趁我还活着要给你说说，要不再没人能给你说了”。她说这话时，一种预感一下跳上心来：“这大概是她的临终嘱语了！”她说从白兰言以下我的爷爷、奶奶和父亲的情况经历，许多确是我不知道的。我佩服她的记忆力，说得那么清楚。叙说父亲弥留之际的细节时，她失明的像乌暗黑洞的双目中，似乎漫着泪水。我听人说瞎子是不会流泪的，是否如此呢？我至今不知。 (二)诉说她这多年的悲苦及对我的思念。说听到我“出事”后，她和爸、妈一样，“心都碎了”，但为了安慰照顾爸爸，不敢流露。现在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前途，问我“你能回到共产党内吗？”我只能告诉她恐怕没希望，不在党里我也会好好干革命工作，她叹气说“小安(诗弟的小名)也这样说。我真不明白，你们都是忠于党的人，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容呢？”她是个不懂政治的人，但有个特点，就是



诚带小薇和小波重访翠湖

绝对以父亲和我、诗弟的是非爱憎为自己态度的依据。好像这就是她的“忠贞”。父亲和我们说共产党好，她就绝对相信共产党好。现在仍然如此啊，但却也有了这个“为什么”的疑问！（三）告诉我她给我留着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上小学、中学时的少数课本、作业本，高祖白兰言的木刻版诗集、兰花画幅、山水画幅和书法条幅和几张扇面画，还有父亲在一九二六年被毒打时被血浸染的一套白绸内衣裤、一件老式貂皮大衣，叫我留作纪念。再有几件父亲生前用的毛笔、墨盒、砚台和一些荣宝斋水印信签、诗签等。她这么老年纪，双目失明，却能清楚记得每件东西放在哪个柜子的某层某个抽屉，当时边说边叫我找出来，一点不差，而且都整理得井然有序放置平整。这是她一辈子的习惯。（四）最后还告诉我一些“家门菜”的烹调方法，说“有几种菜是你爷爷、爸爸最爱吃的，只有我做的最好。你记下来，告诉令薇，可以试着做了尝尝”。我按她说的在小本上详细记下，包括选料配料、刀工、火候、颜色等都有严格要求。记得其中一个名叫“脆哨”的菜是我小时她做了我也很爱吃的，回北京后真依法做过。可惜做出来觉得远赶不上小时候吃的味道。在相对而坐听她讲话中，我近距离地注意到她是那么消瘦得惊人，真是“皮包骨”，面如骷髅眼如黑洞，但里面还藏着细密的思维和顽强的灵魂！诗弟说她体重已降到三十公斤以下。为了给她增加点营养，诗弟给她买了些她过去很喜欢吃的有名的吉庆祥糕点铺的吃食，她却放在盒内舍不得吃，诗弟过些天去看时，都已长毛生虫了。再买又再长毛，以后就不买了。看她上下楼吃力，诗弟多次要背她，她说什么也不肯。我也提出要背她走走，她也坚决不干。经我说“这是我多年不见你，想对你尽一次孝心”，她才勉强同意。我背起她，那分量就像背一个小的行李卷，轻得可怜。背着她下楼在走廊、院子走了一圈，边走边告诉她到了哪了，她说“我都知道，你不用说”。这是她唯一一次同意让人背。

大姐祖蘅和坤德告诉我许多关于大姑的趣事，其中最感人也让我最难过的，是她的极端孤苦心境。双目失明后，她再看不见外面世界，也无法与亲人沟通。人们常见她扶着楼梯扶手摸索着上下，在走廊来回踱步，下楼来走进堂屋摸抚家具、板壁，走上楼前两侧小路，步入花坛抚弄枝叶和透空花墙……。这些地方都是她失明前非常熟悉的，不会走错摸错，有时还见她轻抚着这些事物嘴唇颤动似在暗语，大概是把它们当作知音者，诉说自己的悲伤和心事吧。而最能让她满足和慰藉的，是对人“讲故事”。长期的失明，使她的双耳和感觉变得非常敏锐，有人在附近走动、呼吸，她就能辨别是谁。每察觉是诗弟九岁的女儿小波，就会轻声呼唤“是小波吗？来，

过来,太姑给你讲故事”。这是她的“第一对象”,因为小波从小爱听她讲故事,现在一叫就过来安静入神地听,她也就最爱找小波听她讲。其次是大姐和坤德,她俩也较爱听她讲,或许是因为怜惜她照顾她情绪,有时故作爱听。再次是大姐的三个十多岁的儿子辑中、挺中、小毛和已十八、九岁的女儿小润。他们也愿有选择地听她讲些。她脑子中储存的古今中外的小说、故事之多,简直是个小书库。常讲的有中国的《天雨花》、《再生缘》、《十三妹》(即《儿女英雄传》)、《红拂传》、《白蛇传》、《聊斋》、《杨家将》、《红楼梦》、《唐明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外国的有《块肉余生记》(即《大卫考柏菲尔德》)、《孤星血泪》、《复活》、《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珂》)、《侠隐记》(即《三剑客》)、《拉斯普金》等。**还是我小时候她爱给我讲的那些。**这些外国小说,有一部分是林纾(林琴南)用文言转译的。她有一定阅读古文的水平,而且善于按自己的理解想像把故事中的人物场景形象化、生动化。她又记忆力很好,失明后似乎更强化了,几十年前看的东西,现在仍能说得头头是道,十分清楚。讲时加入自己的感情体会甚至“再创作”,语言生动活泼,声调抑扬顿挫,带上面部表情,富感染力,使听者爱听,而且常要听完整个故事或告一段落才舍得叫她中止。小薇去后自然也成为热心的听者,常和小波一起听她讲,一听一、两个小时。我带小薇小波一起玩时,两个孩子还常说太姑讲的故事,并提出她们对故事情节中的一些问题问我,和我探讨。大姑主动讲故事的听众不少,但她从不找妈妈听讲,妈妈有自己的爱好,而且成天为小学的工作和家务忙得不亦乐乎,不喜欢也没时间听她叨叨。她一般也不找来访的亲友听讲,她知道从礼貌上不宜这样做,只是偶有这些人带的孩子听说她故事讲得好,让家里人带着找她求讲,她才讲点。**她是个不论内心经历多少凄苦折磨,都要不失“大家闺秀”自尊和意志的人,**虽然讲故事成了她最大的快乐和慰藉,她也要选择适当对象和掌握时机、分寸的。有些人说她是“古怪”,是“老处女的变态”。我却认为,她是一位典型的深受封建文化熏陶、性格极其自尊、顽强而在时代前进中失落的女性,一个



诚还乡聚:(左至右)前:失明的大姑、
小薇、母亲,后:诚、蘅姐、诗弟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悲剧人物，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这些特点空前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对于这位已不久于人世的老人自己，“讲故事”是她生命之烛熄灭前最后的余辉啊！

和诗弟交谈最多，有时只二十分钟、半小时，有时夜谈半宵。除最初一段谈家事和各自情况外，后来主要是探讨时事政治。内容仍是五十年代书信往来谈的那些问题，以及大跃进、卢山会议批彭以来的问题。我总的仍是个毛主席、党中央的忠诚信徒，认为五十年代我们的观点确实基本是错了，堕入了修正主义，被划“右派”是应该的；大跃进以来有这样那样错误，但总的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多者到“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他听我阐述这些看法时，只静听不表态。感觉得出他是不大同意的。后来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的看法。对一九五六年到五七年的讨论，他只说他基本上仍是当时的看法，这些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再思考思考，以后再讨论。但对大跃进、批彭德怀，他明确说认为都是错误的。这几年实际的措施是在纠正这些错误，只不过不公开明确承认而已。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几次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责任主要在中央”，甚至说了“错误要立碑铭记教训”的话，不过为了照顾毛主席的面子和心理，有意在词句上作某些含糊和限制，说是“某些地方”“某些基层的情况”等。还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若干年后再来总结”。提到了取消不取消的高度，实际上至少是认为应该考虑取消、否定，不过现在时机未到，先不说吧。他听到的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内容和有关情况显然比我多而具体，他的理解又比我深入比我放得开。他说到一些传闻，如说云南向中央反映群

众面对“共产风”和严重困难时思想情绪说，一些地方“民怨沸腾”，中央没回应；后来反映有些群众已“铤而走险”，仍然没回应；最后反映“民不言矣”，中央几位领导人中才有人（可能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中之一人）才说，“老百姓不说话了，鸦雀无声，这是到了最危险的地步！该下决心解决了”。这些传闻自然可能是“人民文学”，但生动而震撼人心。（今天我倒觉得不一定只是想像传闻，而是可能包含真实情况的传闻）。听了这些，五



诗弟夫妇和小薇、小波游西山

十年代我和他讨论争论时那种弟弟可能比我思想更敏锐想得更深的感觉，又重现心中。我再不坚持自己意见，只说继续观察思考吧，将来历史的发展会说明什么正确什么错误。实际我那种对毛泽东的一切都盲目崇拜的思维方式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虽然还没有根本的动摇。

诗弟夫妇俩似乎工作都不太忙，生活比较轻松，不像我终日从早到晚忙累得要死，“自己苦自己”。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夫妻恩爱，两人对孩子都很疼爱，生活无虑，小家庭很美满。完全想不到后来会产生危机直至破裂啊！诗弟在中学教物理。以他快毕业的物理系高才生的水平，教这点课轻而易举，不需怎么备课就能讲得清楚明白，而且深入浅出，生动易懂，还不时结合讲课用实验、解题等方法来论证，学生们都受吸引。他爱好音乐，有时在学校弹钢琴拉手风琴和引亢高歌，学生们都跑来听、学，在家则闲暇时弹一架爸爸留下的老风琴，自弹自唱；或他弹琴他夫人在旁站立拉小提琴，合奏小夜曲等西方古典名曲。我记起了儿时有时看父亲在风琴上弹奏吟唱中文的《思乡曲》、《送别》、《西湖十景》等歌子，自己也跟着演唱的情景。我从小就缺少音乐细胞，五音不准，但却爱听歌唱歌。诗弟说他也记得。说着便边弹边唱起了“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十里水平湖，一天凉月，万倾秋波……”等美妙的歌词。我也跟着低唱起来。时光好像一下拉回去了二十多年！啊，童年，无邪的童年多美好啊，永不可再！

诗弟还会自己洗印和放大照片。他拿出他们的相册给我看，有的放大到十二寸，放得很好。这引起我的兴趣，想学。他就晚上带我到楼下原来我和芸姐住过的那间房后的廊屋，原来这儿是他自己设置的暗室。里面窗子全用深色布帘遮挡，虽不太严密，但因是晚上，屋内已是漆黑，只有一支小瓦数的红灯泡稍为照明，可以看见器物。因为感光相纸是不怕红光的。他自制了一套洗印相片的设施工具，还自制了一座放大机架子，把照相机打开后盖固定上去做放大镜头。给我讲了点摄影原理，详细教我这些设施工具的用法，和掌握调整曝光时间、强度和洗印液浓度、浸泡时间等方法。然后就开始示范操作。我学得津津有味，很快基本掌握了。没想到这套技术后来“四清”中我负责做筹办“阶级教育展览”时，还用上了。我和诗弟一连几天，每晚都在那里，把到昆后照的一些相片都洗印出来。大姐和有的孩子们好奇和感兴趣，有时也来暗室中在红灯下观看。还发生一件小小趣事：有的底片曝光过度（术语叫“过厚”），诗弟说可以“减薄”，就是用一种叫“赤血盐”的药液浸泡，掌握好时间和浓度就可达到希望的厚度。我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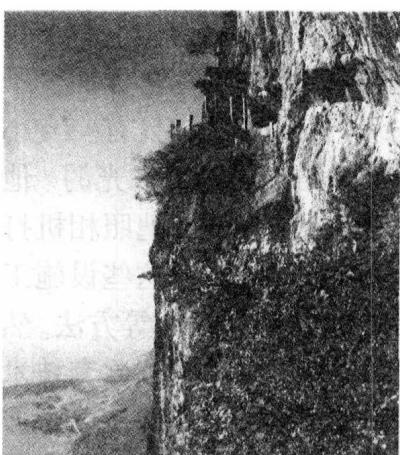
他试了两张，基本成功。我们弄时，大姐祖蘅也在旁观看。弄完了诗弟嘱要认真洗手，因为那药液剧毒。大姐惊叫起来，说她可能手碰过药盘，然后说感到头晕了，要上医院求救治方法。诗弟反复告她即便手真地沾了药液也没关系，只要没吃进嘴，不会头晕，更不会中毒。她仍精神很紧张。我又告诉她我操作时是真的碰了药液，并没感到头晕或任何不适。劝她洗手后安心休息，要上医院也等明早再说，现在这么晚了去也找不到合适医生。她稍放了点心。第二天早上什么事也没有。大家都乐了。

一些天的共同生活接触，使我感觉诗弟夫妇的生活比我和妻优越舒服得多。甚至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点“贵族化”了？那时我是相当“左”的。而我和妻在北京的生活，即使是在被打成“右派”以前的那些年，哪有过这样的轻松舒适啊！当了“右派”后更长年累月除了紧张艰苦的劳动、开会检查、接受批判外不知其它。不过我也并没有忌妒或多么羡慕的心理。云南有云南的环境，雨罢青山，龙门更断魂，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条件与方式。弟弟两口子过得轻松点舒服点有什么不好不可以呢？如果不是因受我株连而也成了“右派”，他们不是能过得更好吗！

诗弟夫妇也陪我重游了昆明一些地方，翠湖、园通公园、大观楼、西山…并带着小薇和他们的女儿小波。俩小姐妹亲密无间，玩得十分高兴。一同照了不少相。重游旧地，不免忆起许多往事，有许多感慨。我们兄弟双双陷入逆境后，第一次有机会当面畅谈心曲，不仅在家中诗弟屋内，在游览

途中也是这样，总有谈不完的话。游西山龙门时遇大雨倾盆，我有感吟成一首七律《大雨中登西山龙门》：茫茫烟雨出混沌，雨罢青山欲断魂。万仞龙门云壁立，五百滇池海埂横。茂林修竹染新翠，碧瓦朱墙洗旧尘。游子情同天水阔，更将笑语唤雷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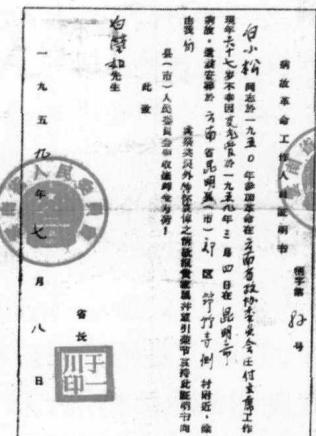
是啊，让这大雨把我身上的和亲人间污染的尘土统统荡涤尽吧！让震天动地的雷声驱走一切人间的邪恶和亲人间的隔阂，呼唤回童年和青春、亲情和光明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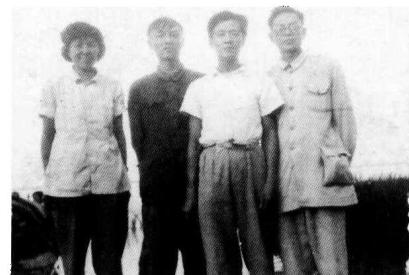
风雨雷神唤，龙门人断魂

诗弟还抽空陪我去上父亲的坟。我这时虽然仍牢记“组织上”的“严格划清阶级界限”之嘱，但对我的束缚已不大了。云南省“组织上”对他并没有定什么“反动”之名，他去世后仍按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对待，经省长于一川批准，安葬

于风景秀丽的西郊筑竹寺旁。筑竹寺以其雕塑精美生动的五百罗汉著名，但我已不记得过去是否去过了，可能从未去过。在坟前我和诗弟及大姐的女儿文绮、儿子挺中并排深鞠躬时，我想起了父亲曲折的一生和悲苦离世的结局，又想起了自己在三年前听到他死讯时的冷漠无情，不禁泪下。是的，我仍然坚定地相信党，要跟党走，要站稳立场。但对于这样一位也跟党走的父亲，为什么这样无情呢？和妈妈没有像和大姑、诗弟那样的畅谈。妈妈太忙，也不愿多谈过去的事和涉及政治的问题，而我们兄弟出事和父亲去世一段的情况和心情她去北京时已对我详谈过了。现在她关心的是实的家人生活，从买菜做饭到儿女孙辈每个人穿衣起居，她都要操心操劳，小薇来后她更在这个孙女身上倾注了心血和精力。她找或买了一些白色与绿色的绸子，给两个孙女小薇和小波各做了一套同样的小衣裙，两个孩子都非常喜欢，一块穿起来站一起特别漂亮，惹人喜爱。我到后就带她们玩翠湖照了相。我去了妈妈更特别关心我的饮食，每天亲自下厨换着样给我做菜。我说我喜欢自己出去吃点昆明小吃，特别是总念着吃小时最喜欢的小锅炒饵块和小锅米线，这是真话，当然也有减轻她老人家劳累的用意。这样她才留下几顿饭让我自由去买吃。所幸现在是暑假，她学校工作基本没事，当然她也不时要去看看。我也由妈妈或蘅姐、诗弟陪同去看些在昆的其他亲属，包括舅舅、舅母，二叔二婶，祖芬姐等。但对被划了“右派”的三叔、二舅、堂兄祖诠等，我没去见。我“自投罗网”时的教训深刻在心，“组织上”要我“划清界限”的“告诫”响在耳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更总长鸣在心。这有私心，怕对自己不利影响，也是怕给别人再惹麻烦。我觉悟很迟缓，在此后许多年中，在涉及自己问题时，仍然不能摆脱这类思想上的枷锁。不过，去给父亲上坟这事，我一点没犹豫。怎么说，他是一位善良的父亲，对民主革命做过贡献的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他可能有思想跟不上的地方，但组织上也没定他什么错



省长亲批父亲葬于
筑竹寺旁的文件



诚与蘅、诗和挺中甥上父坟

误。去世后还按民主人士和他生前的职位给予礼遇安葬。我有什么理由不到坟前哀悼呢？其实，内心考虑这些，就是荒唐，就是没有完全摆脱精神枷锁的表现！彻底甩掉这个枷锁的觉悟进程是很迟缓艰难的。不过，比起四年前我刚听到他逝世时的表现，我终于进了一大步。啊，“阶级界限”，“阶级界限”！这个阴魂对心灵缭绕得多深啊！

我在昆明坚持督促小薇做功课。允许她和婶婶一块来昆明时，就讲好了一个条件，她必须按课本预计的进程，自学耽误的功课，包括阅读和作业，并规定要她每周给在北京的爸爸、妈妈写一封信汇报功课完成情况及在昆明的生活情况。孩子基本上照办了。我来到昆明后，检查她自学的成绩，出乎我意料，居然语文都能读能讲，生字会认会写；数学题会做。母亲直夸这孙女聪明和自觉、遵守规定要求。

时间过得很快，已到八月初我和妈妈、姐、弟们说明我的假期将满。收拾准备和互相千叮万嘱一番，买了从昆明直达安顺的长途汽车票，在依依不舍中启程了。从安顺换乘火车。从车站得知：按里程远近，中途可以下车一定时间，搭下一次或再下一次的去北京的车都可以，当然只能是同样的慢车。我立时生出一个想法：我们里程长，算算路上可下车二十多个小时。已进中年的我，除了上大学从昆明到北京，现在又第一次探亲从北京回昆明外，三十多年中就没到过其它省市，更别说去什么名胜景点参观了。现在顺路有点时间，也不多花车钱，何不就便看点地方呢？十岁的孩子听了我这个想法，高兴得要跳起来。我拿出随身带着的一小本中国交通地图，沿铁路线查看，向列车员和其他旅客打听，作出了个计划：先到长沙看看毛主席诗词中提到的湘江、橘子洲、岳麓书院；再去韶山毛主席故居瞻仰一下伟大领袖少小时的生活和成长环境；第三步是尽可能争取去一睹有名的岳阳楼和洞庭湖；最后从岳阳或长沙上车回京。总算也就多花两天时间，八月一十号前能赶回北京按期上班。

回程的行李，少了挑西瓜的担子却多了一支老式的中国大黑皮箱。那是大姑指点着我腾出的一支装被褥衣服的箱子，据说是真牛皮做的，很结实，带有黄铜锁扣和两帮上的黄铜提手。把大姑陆续给我找出的父亲的一件老貂皮大衣、一套他被打伤的血衣和一些字画、文具等遗物。最可贵的是，我在纸堆中找到了父亲的十几首残留诗稿。这是他“焚稿断痴情”后意外发现而得以留存的唯一遗稿！我汇集起来，细心抄录了一份，连同原稿带回北京。十分可惜可悲的是，“文革”中这原稿连同其它家存的父祖辈的诗文书画一块被毁了。只有我为了学习写诗参考而另纸选抄下的十多首，

因另放一处而得幸存下来，还有父亲一九四八年信中手写的他在圆通山看见军警包围云南大学而感愤的那首七律，我挨整时连信一并交上去，后退还我信时这张小花签仍在，成了父亲诗文中唯一的亲笔遗稿。“文革”结束后，我把“名冠云滇”的父亲的这十几首劫后余灰之诗，复写了若干份，给姐弟和有的父亲生前老友。后来有些人传抄的和报刊上回忆父亲文章中引用的诗，都是这份遗稿。我还找到些我小时的课本、画册，以及姐、弟们送我一些小东西，连同我带来的而估计回去路上用不着的衣物，统统装进大箱子。原来想仍用挑担办法，但相当沉重。久经劳动锻炼的我也拚力才刚能搬起来。用随身带着备用的衣物等根本称不起来没法挑，背也不行，体积那么大，行动很不便。再考虑到还带着孩子，路上要换车、住店，没法随身带它。决定花些钱办托运。家人们送我上了长途汽车，大箱子放车顶行李框架内绑好。到了安顺，我自己背到了火车站，幸而距离不远。我第一次学办直接托运北京，居然办成。办完后时间有余，在站傍休息了一阵才上车。

车开了，带着亲爱的小女儿，比来时少了孤身赶路的紧张寂寞，少了行李负重，只挎随身一个书包，多了轻松和情趣。但也多了新的紧张和辛苦。女儿人小但活泼、求知欲强，一上路就不断说这说那问这问那，我满怀温馨也不能不聚精会神地听她说、回答她的提问。车过贵阳后，上车人越来越多，硬座厢内挤得水泄不通。幸而在安顺上车时我还搞到一个坐位，虽不靠窗也不靠边，夹在座椅上两个人的中间，但比那些根本没座的人强多了。只是到了要打开水、买饭和上厕所时麻烦大了。一般是让女儿占着座并托两边的人照顾，我连挤带爬地去办。但遇到孩子也要上厕所，我不放心她一人去，只能陪着她去，在密集的人丛和行李中翻爬蛇行。经过的旅客都还不错，尽量让路帮忙，大概看着孩子小又可爱和我的窘相生了同情心吧。麻烦归麻烦，路上还是很有趣的。小薇是享受免票，但不能占座位，由我抱坐膝上。但她大多数时间不坐，而是站到车窗前看飞驰而去的景色。后来靠窗的旅客主动为我们换座，叫我靠窗坐。这样孩子可以半坐半立地看景。离贵阳后一段黔东高山深谷景色吸引了小薇使劲伸头外看。铁路弯道甚多，我灵机一动，拿出相机，跑到前面一个窗口，伸出头去叫她注意，抢照了张相。这是此行很有意义和情趣的相片之一。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到了株洲，已是晚上，要换乘京广线车。我们父女二人下车先买好次日一大早去长沙的火车票。按里程到北京前可以下车两整天时间还多。脑